

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闻学理论的经典论著。

书中收录了宁树藩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史料丰富、考据严谨、笔法灵活、语言流畅，为把握中国新闻史发展脉络和研究、学习新闻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宁树藩文集

（增订版）

「新加坡」卓南生 程曼丽 编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13

宁树藩文集
(增订版)

〔新加坡〕卓南生 程曼丽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树藩文集 / (新加坡) 卓南生, 程曼丽编. — 增订版.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02-45926-2

I. ①宁… II. ①卓… ②程… III. ①新闻事业史—中国—文集
IV. ①G21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734 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封面设计: 郭宏观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沈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mm×230mm 印 张: 40.5 字 数: 51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产品编号: 071448-01

宁树藩简介

宁树藩，安徽青阳县人，1920年10月生。1941年就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文系。1949年11月起任教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55年调该校新闻系（现新闻学院），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研工作，往后兼治新闻理论。1985年评为教授，次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合著有新中国最早新闻史教材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新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辞书《新闻学词典》和《新闻学基础》。任《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的副主编，现代卷的主编。主持国家研究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曾参加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评议工作。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系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副会长。1991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离休，返聘至1997年。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宁树藩等10位海内外知名学者被聘任为首批研究会导师。

2015年，宁树藩和甘惜分、方汉奇一同获得新闻史学会颁发的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终身成就奖”。

2016年3月6日上午8时2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总序

〔新加坡〕
卓南生² 程曼丽¹

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

1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2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4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u@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年7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年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前行，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亦是一份历史责任。

2014年10月14日

复会6周年纪念

《宁树藩文集》（增订版）出版缘由

（新加坡）卓南生 程曼丽

《宁树藩文集》是我们在 2003—2005 年任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顾问期间，为该学院“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主编的“史论篇”的两本文集之一（另一本为《方汉奇文集》）。

鉴于 2003 年版的文集有不少疏漏之处，我们在 2004 年 12 月又出版了精装订正版。本次的增订版是以 2004 年精装版为蓝本，加上之后宁老师撰写的两篇长稿和一篇宁老师生前接受访谈的稿件。

在编辑过程中，承蒙“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主编、时任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婉莹教授的鼎力支持、宁树藩夫人查爱真女士及其女宁晨云女士的协力合作，谨此致以谢意。感谢北京大学金光新闻教育基金为本文集增订版的出版提供赞助。

谨以此书呈献给一生忠于学术、热爱新闻史研究的已故学界前辈宁树藩先生，并借此发扬宁老先生“此生不息，探索不已”的精神。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民主革命时期）	1
迈向灿烂明天的历史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党报八十周年	42
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	59
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历程 ——夏林根主编《中国近代名记者》导言	79
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	97
“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	114
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	144
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	156
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	167
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几点意见	174
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1920—1927年）	181
中国的报纸副刊是怎样诞生的	206
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	211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219
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	225
陈独秀与《新青年》	245
蔡和森与《向导》	258

宁树藩 丁淦林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	27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	289
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	306
评《开智录》	宁树藩 陈匡时 译 317
陈独秀与《向导》	331
怎样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	343
史量才办报的成功之路	358
怀念汪英宾教授	
——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	365
19 世纪香港报业概述	373
关于《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	380
发扬优点 继续开拓	
——纪念《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	389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评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394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序	397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序	400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序	405
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	
——喜读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408
上海新闻事业知识的宝库	
——评《上海新闻志》	419
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序	422
新闻学研究中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426
党报应该重视“读者需要”	
——重读王中同志关于“读者需要”的论述	436
论新闻的特性	445
新闻定义新探	457

松本君平与《新闻学》	466
“有闻必录”考	472
裘正义《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序	489
黄旦《新闻传播学》序	492
桑义燐《新闻报道学》序	496
唐惠虎《舆论监督论》序	502
王益民《系统·比较理论新闻学(讲稿)》序	506
新闻学园地里的耀眼新葩	
——《传媒角色论：新闻传媒角色与个性风格》一书读后	510
林语堂著、刘小磊译《中国新闻与舆论史》序	514

附 录 一

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

——宁树藩教授访谈录 芮必峰 536

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

——宁树藩教授谈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曾建雄 551

“新闻铸春秋”

——宁树藩教授谈中国新闻史学会与《新闻春秋》 毛章清 561

附 录 二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

——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 宁树藩 丁淦林 整理 573

访问陈望道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一稿的回顾 宁树藩 582
《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 594

后记 62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民主革命时期）

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进行改造，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过去曾有些同志对这项研究作出过不小贡献，但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中加以系统考察，则是一新的课题。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量难以胜任，而且也非一篇文章能把问题讲清楚。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以商讨，旨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如有更多的同志开展这项研究，那就很好了。

本文探索的时间范围限在民主革命时期，并按历史顺序，分以下阶段进行论述：

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中文书刊上还没出现过马克思的名字。直至19世纪的最后一年，才在一家外国人办的报刊《万国公报》（1899

年2月)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百工领袖”,称他的学说为“安民新学”。当然,这种点滴介绍,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到20世纪初期,在一批奔赴国外(主要是日本)寻求救国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兴起一股小小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曾不同程度地被介绍过来。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注意,可以说是在这个潮流中开始的。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或是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仍隶属资产阶级革命派),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出发,都曾在自己所出版的书刊中多次谈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涉及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问题,《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某些内容,则在1903年第一次被译介与中国读者见面。¹中文书刊之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报活动,也就始于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广智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简介了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和投稿《纽约论坛报》的活动,这也许是中文书刊中关于马克思与报纸关系的最早记载。以后续有介绍,但均未触及马克思的办报思想。

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虽曾表现出某种同情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介绍马克思的活动及其片断学说,或者是简单为了“牖新知”“广见闻”的需要(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者只为自己的思想主张寻求借鉴(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与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自然,这个时候也就不可能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办报的现象。

1 见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一文。

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头脑——主观世界，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向西方文明寻找救国方案的企图破产。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很快，一股介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南到北一下澎湃起来了。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一潮流汇集为一种改造中国的巨大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种新型的报刊破土而出。它一出现，就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战斗。这种报刊主要是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以及在党领导下的青年团报刊以及工农等群众性报刊（当然也包括某些为数众多由共产党员主持编务的国共合作出版的报刊）。如果说，开始时只有寥寥数种，可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已出版有近300种之多，可以说是一支颇为壮观的新闻大军了。

这些报刊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之下开始成长起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界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关于报刊观念的变化。集中的是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阶级观念被引进到新闻事业的领域来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办的报刊，无不确认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的公开做了申明（如《新青年》季刊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罗针”）¹，有的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向读者讲明这一点（如《中国青年》等），但实际上也都是这样认识的。同时，革命的人们也广泛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种种新闻现象，指出某某报为资产阶级报纸，断言资产阶级的报纸和他们的法律一样，“是对付工人阶级的工具”²，批评了报纸是所谓社会舆论代表等

1 《新青年之新宣言》，载《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2 江四：《无产阶级的战术》，载《平民之友》，第15期，1924年9月19日。

“超阶级”的口号。

如果包括在华外报，中国出版报刊到那时已有百年历史了。在五四以前这整百年的岁月里，有谁会把“报纸”和“阶级”联系起来呢？人们至多承认自己的报纸的党派性，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报纸的阶级性；人们可以对反动报纸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却从没一个人对它的阶级性进行揭发。

事实表明：一种从未有过的把报刊看作是一定阶级舆论工具的新观念出现了，它与那种认为报刊是社会公众舆论机关的传统观念对立起来，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在后人看来，也许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变化。但是，这是一种至为深刻的变化。新闻战线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革命，与此紧密相连。

对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也由此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变革，在此以前，几乎整个进步新闻界，都把这种自由看成是绝对的永恒的原则加以崇奉，不少人表示要毕生为之奋斗，求其实现。他们虽曾激烈地抨击一些反动报刊，但并不反对它们存在的权利；他们虽曾对一些反动言论表现出满腔义愤，但又认为报刊发表这些言论，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又因为他们把言论出版自由看成绝对的永恒的原则（这必然成了脱离阶级内容的抽象原则），而他们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往往成了争取立法条文的斗争。这种观念是相当牢固的，到了北伐战争时期，著名的进步报人戈公振在谈到言论出版自由时，所提出的主张还是“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¹。这种绝对自由观点，当时从总的方面看，在政治上有很大积极意义；然而它是不科学的，其政治上消极的一面也在不断表露出来。

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如此牢固的传统观念，被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十七节。

影响的先进分子)一下冲破了。他们认为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就只有统治阶级出版报刊欺骗人民的自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¹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人民政权的统治下,也决不会给反动派以言论自由,在那里,“言论只能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要给他剥掉,和以前恰恰相反。”²陈独秀的转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原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原则的信奉者,可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变化了。他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对《时事新报》《新申报》《顺天时报》等反动报纸的禁售,他说“民权自由若为这些报纸而设,还有什么价值?”³短短几年,前后判若两人。

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原则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保持一致,这是报纸观念的又一巨变。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规定“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对违反这一原则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共青团中央也作出类似的决定,要求“各地刊物所发表之意见,应严格求与中央刊物态度一致”⁵,并指明团的宣传工作应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为了推动这些原则的贯彻,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党中央对所出版的报刊和宣传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党报宣传工作,经常印发宣传大纲以统一宣传口径,等等。党还根据这种原则

1 参阅《言论界之不平鸣》(《向导》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五一”劳动节与农民》(《中国工人》第五期)、《南洋烟厂罢工中上海报刊之原形》(《向导》第八十四期)、《向导周报与劳动阶级》(《中国工人》第三期)等文。

2 《向左还是向右》(润),载《政治周报》,第二期。

3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实),载《向导》,第一七五期。

4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决议》(1921年)。

5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1925年)。